

日本学界罗振玉研究综述

张 亚 敬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Luo Zhenyu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ZHANG Yaj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Japanese research status of Chinese scholar Luo Zhenyu in the form of a summary,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first, *Calligraphy Theory* No. 32: Luo Zhenyu Special Collection; second, Luo Zhenyu's visit to Japan and exchanges with the Japanese, thir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uo Zhenyu and his friends; fourth, Luo Zhenyu's participation in paint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and his collections; fifth, Luo Zhenyu's creation of oracle bone and Dunhuang studies; and sixth, others. The paper aims to broaden the reader's research vision and help scholars obtain more academic information.

Keywords: Luo Zhenyu, research overview, Sino-Japanese interaction

关键词：罗振玉、研究综述、中日交涉

罗振玉（1888-1940），字式如、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号贞松老人。罗振玉一生涉猎广泛，著述良多，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位置。郭沫若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谈到：“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罗继祖¹⁾也对祖父的学术贡献做过以下评价：“顾古物初出，举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通之者，鉴于事之艰巨，辄中道而废，即有其愿与力矣，而非有博识毅力如先生者，其书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间世而出之神物，固将有时而毁且佚，或永锢于海外之书库中，虽出犹不出也。”²⁾于是我们可以通过罗振玉的学术之路，探知甲骨之发现，敦煌学之初创，农学之发展，故宫学之萌芽，还可以跟随他的足迹，追溯近代中日学者间的交往，回顾战火下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京师图书馆的创立等历史档案。

罗振玉一生多次赴日，与日本人交往频繁。辛亥革命后，曾携家眷前往日本寓居将近8年，带去了大量的文物及个人藏品，对日本的汉学、书学、文字学、文物收藏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以

1) 罗继祖，字奉高，罗振玉长孙。

2)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2集，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414页。

综述的形式介绍日本学界关于罗振玉的研究状况，在罗振玉交往的日本友人中，内藤湖南是较早对其学术贡献做出评价的学者。翻阅《内藤湖南全集》，随处可见内藤对罗氏学术成果的摘录和分析，如在《東洋文化史研究》一篇中有〈支那上古の社会状態〉³⁾一文，详细地记录了罗氏赴日后的著述情景，在没有职务的情况下，罗振玉潜心著书，先后出版《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殷墟书契后篇》、《殷墟书契菁华》、《殷墟古器物图录》等著作，不仅为中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资料，还积极地投入到考证的工作中，对此内藤湖南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在《清朝史通论》⁴⁾中说到：

“今まで昔の人の著述に就いて小學を研究して居たのを、發掘物に就いて小學を研究するといふ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是は今日京都に来て居る羅振玉氏なども、此の點に就いては研究して居る大家であります。”

本文将日本学界对罗振玉及其书法相关的研究按类型分为六个部分进行梳理，分别为“《書論》第32号——罗振玉特集”、“罗振玉赴日及与日本人的交往”、“罗振玉与友人往来书信”、“罗振玉参与的书画活动及其收藏”、“罗振玉和甲骨学、敦煌学的创立”及“其他”。

一 《書論》第32号——罗振玉特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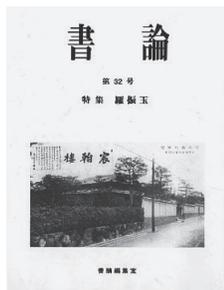


图1 《書論》32号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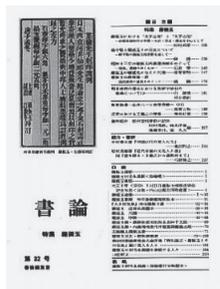


图2 《書論》32号目录

《書論》是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书法史研究方面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隶属于书论研究会，1972年8月首刊，本着对学术负责的要求每年发行一期，目前为止已发行46期。现在杉村邦彦任书论研究会会长，石田肇任副会长，关东地区负责人由筑波大学艺术系教授菅野智明担任，关西地区则由井後尚久负责，他们不仅是书论编辑室、书论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更是日本学界研究中国书法方面最具代表和权威性的学者，他们治学严谨、著作等身，是我们了解日本研究不可忽视的学人。2001年3月31日《書論》第32号发行了关于罗振玉研究的特集，前半部分刊登了1998年8月9日在京都思文阁举办第二十回书论研究会时，召开的“羅振玉とその交友”特别展的展品。共展出罗振玉书法作品50件，其中大部分为篆书临习作品，行草书立轴有四件，隶书作品《临西峡颂》、《临百石卒史碑》两件，楷书作品《临欧阳询九成宫礼泉銘立轴》、

3) 内藤湖南，〈支那上古の社会状態〉（《内藤湖南全集》第8集，1969年，筑摩書房）10頁。

4) 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論第四講經學——晩季の大家坩説中葉以後の宋學〉（《内藤湖南全集》第8集，1969年，筑摩書房）372頁。

罗振玉撰并书丹《藤田丰八墓表》等，同时刊登了罗振玉致内藤湖南、小野玄妙、松崎鹤雄、松丸东鱼尺牍各一封。除此之外，还刊载了五篇关于罗振玉研究的论文，不仅在资料上做了新的补充，而且在罗振玉书学研究的推进上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下面将论文作者及题目列出以资参证：

- 1) 杉村邦彦《羅振玉における“文字之福”と“文字之厄”——京都客寓時代の学問・生活・交友・書法を中心として》
- 2) 陈捷《楊守敬と羅振玉との交友について——楊守敬の羅振玉宛書簡を通して》
- 3) 石田肇《昭和十三年の羅振玉所蔵書画展をめぐって——没後、書画のゆくえは》
- 4) 菅野智明《羅振玉が顧燮光に与えた尺牘》
- 5) 钱欧《羅振玉の教育論一斑——国民教育の普及をめぐって》。

杉村邦彦⁵⁾一文将罗振玉的研究方法归纳为集录和考证两类，其中集录较多，考证较少。对此，罗振玉自己也曾说：“先前与同行论证金石学，当以传录文字为最要紧之为，考证次之。”⁶⁾可见罗振玉自身也是将文物集录奉为圭臬。杉村以《罗雪堂先生全集》为依据，整理了罗氏少年时期至1911年赴日期间的文物搜集情况，并将其分为古印、古铜器、金石拓本、古镜鉴、古明器、钱币、瓦甗、符牌、甲骨多个部分，同时介绍了罗振玉1911年赴日的原由和详细经过。京都旅居期间的罗振玉拒绝了京都大学讲师一职，因而不得已以贩卖文物维生。杉村推测罗振玉的藏品经内藤湖南等人介绍，通过经营大阪出版社的原田博文堂，大部分都卖给了关西财界的权贵人士。就书法而言，罗振玉虽不以书家自居，但传统文化赋予了他高超的艺术洞察力，学问底蕴塑造了他温尔儒雅的书风气质，杉村以“恭敬不敢放肆，法度端严”评价罗振玉的书法，可谓十分精准。

陈捷⁷⁾一文，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邻苏老人手札》和内藤湖南编《清朝书画谱》中杨守敬致罗振玉信札为材料，考察了二人的交友关系。尤其对辛亥革命前后两人交际的不同进行了介绍，辛亥革命之前两人互赠资料，甚至连研究成果也相互吸收，可谓亦师亦友。辛亥革命之后，二人的通信则主要围绕《水经集注》出版一事展开。彼时，杨氏为《水经集注》的出版极力奔波，罗振玉却没有积极地参与进来，于是杨守敬在和王先谦等友人商议后，准备在永州刊刻出版，可惜的是，未能等到著作问世，杨守敬便与世长辞。杨守敬与罗振玉先后赴日，交往频繁，他们的经历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如都对日本书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守敬甚至被尊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同时也都为中国古籍善本、孤本图书的回归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在宋版汉籍方面。但是，他们的赴日交流也有许多不同，例如杨守敬的书学思想经日下部鸣鹤等书家的传承和发展使日本书坛焕然一新，掀起了六朝书的浪潮。而罗振玉赴日及其书学史观却助力了京都地区学者们的“尊王之风”。

1938年，罗振玉在日本出版了《贞松堂藏历代法书》和《白爵斋藏历代法书》，这两本法书所收藏品十分珍贵，但以其所收藏品为主体，先后在东京、福冈、京都举行的“上虞罗氏所藏晋唐宋元明清名人法书

5) 杉村邦彦，《羅振玉における“文字之福”と“文字之厄”——京都客寓時代の学問・生活・交友・書法を中心として》（《書論》32号，2001年，书论研究会）。此文有中文版刊登在刘恒，张本义主编《如松斯盛：首届罗振玉书法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万卷出版公司，92-116页。

6) 罗振玉，《蒿里遗文目录序》（《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三，台北大通书局）。

7) 陈捷，《楊守敬と羅振玉との交友について——楊守敬の羅振玉宛書簡を通して》（《書論》32号，2001年，书论研究会）。

展览会”却鲜为人知，与罗振玉相关的著作和年谱中亦未见相关记录。于是石田肇⁸⁾围绕此次展览会展开了考察，文章首先以展览会宣传册以及展览关系人正木直彦的《十三松堂日记》为中心，介绍书画展的经纬。《十三松堂日记》十分详细地记录了正木直彦感兴趣的展品，甚至连作品中的题跋也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介绍了展览册的相关内容，包括举办人致辞、展品目录等信息。同时，石田肇还推测《白爵斋藏历代法书》之所以有两种版本刊行，是因为无刊记的一版是用来答谢赠送宾朋的，而有刊记的一版则是用来标价售卖的。通过石田肇此文的介绍，让我们对罗振玉在日期间的书画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菅野智明⁹⁾再录了《鼎齋》杂志中刊登的“罗振玉致顾燮光尺牘十三札”，因这本出版于民国时期的杂志目前已不易查阅，所以将尺牘原文录入，并对尺牘的执笔年代进行考察，根据尺牘内容我们知道，罗振玉在京都寓居期间，顾燮光曾多次为其提供金石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顾氏提供的资料，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到罗振玉的著作中，虽然这批手札只是罗氏研究中非常细微的一部分，但顾燮光在这之后也继续为罗振玉提供帮助，而且像顾燮光这样围绕在罗氏身边的人还有很多。罗振玉之弟罗振常便是如此，他经常替其兄到安阳搜集甲骨，所以菅野指出应该对为罗振玉收集材料的提供者进行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罗振玉的学问基础。另外，菅野还在文中为顾燮光作传，不仅涉及生平，更对其所从事的著录、出版活动进行介绍，比如在杭州设立出版社等功绩均作记录。文章最后对尺牘中涉及的金石学著录、金石学家进行梳理，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钱欧¹⁰⁾一文主要对罗振玉的国民教育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文中指出，早期的罗振玉十分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国之基础，他主张“提倡普通教育，重视德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体育和卫生等”如果不能普及教育，像义和团这样的团体便不能彻底消失，这也侧面反映出罗氏的文化理念。

二 罗振玉赴日及与日本人的交往

杉村邦彦除了《書論》罗振玉特集中关于罗振玉京都时期学问、生活、交友、书法的研究外，《书学叢考》¹¹⁾近代日中交流史研究一章也对罗振玉与日本人的交友关系进行了介绍。杉村将罗氏与日本人的交往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97-1911）罗振玉专注于农学振兴与日语教育，因而交往的日本人大多是农书的翻译者、日语教师、农学机构的相关人员或学校领导；第二时期（1911-1919）罗振玉的关注点转向了中国历史和文物搜集，接触的日本人多为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和书画、古器物的收藏家；第三时期（1919-1940）罗氏在与前两个时期结识的日本友人继续交流的同时，也开始和满洲国时期的日本人进行交往。另外，杉村还对罗振玉在京都期间参加的兰亭会、寿苏会、杨守敬追悼会等进行了考察，特别强调了罗振玉与内藤湖南在学术上的互动。

8) 石田肇，〈昭和十三年の羅振玉所藏書畫展をめぐって——没後、書畫のゆくえは〉（《書論》32号，2001年，书论研究会）。此文有中文版刊登在刘恒，张本义主编《如松斯盛：首届罗振玉书法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万卷出版公司，142-153页。

9) 菅野智明，〈羅振玉が顧燮光に与えた尺牘〉（《書論》32号，2001年，书论研究会）。此文还收录在菅野智明《近代中国の書文化》第四章，2009年，筑波大学出版会。虽涉及收藏而略有变化，但主要还是围绕信札展开论述。

10) 钱欧，〈羅振玉の教育論一斑——国民教育の普及をめぐって〉（《書論》32号，2001年，书论研究会）。

11) 杉村邦彦，〈羅振玉の日本における研究生活とその交友関係〉（《书学叢考》2009年，研文出版）。424-449页。

菅野智明与猿渡康文¹²⁾以罗振玉日记『扶桑再遊記』为基础资料，将日记中出现的精通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鉴藏家、出版人、书法篆刻家等置换为点与线的图表，并从中找出具有纽带性质的中心人物，再通过中心人物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来阐释图表中呈现的人物关系特点。文章的第五部分详细地分析了德富蘇峰、島田翰、平子尚、田中慶太郎、河井仙郎等中心人物是如何与罗氏产生互动并影响其考察路线和考察成果的。筑波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协同合作，导入“社会关系网分析法”，从量化后的客观的数据入手，整理出罗振玉与日本人的交游图表，并推测这样庞大的交际网是由田中慶太郎主导形成的，在田中的主导下，不同领域的中心人物相互强化、相互联动，共同作用于罗振玉的赴日考察。另外，菅野智明¹³⁾还对辛亥革命前罗振玉赴东京考察时，与中国文化界友人¹⁴⁾的交往进行了考察，菅野认为罗氏刚回国时，曾有意向东京的中国文化圈靠拢，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在大谷光瑞、藤田剑锋、内藤湖南等人的邀请下，罗振玉寓居京都，遂其交际逐渐向京都偏移，因内藤湖南曾与东京学者、说文会产生分歧，于是菅野推测这种分歧也影响到罗振玉与东京中国文化界、说文会原有的联系。

石田肇¹⁵⁾围绕《蒋黼墓誌銘》的撰文和书丹，对罗振玉、内藤湖南、蒋伯斧三人的交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尤其罗振玉与蒋伯斧，两人不仅同乡、同龄且共事于上海、广东、江苏、北京多地，不仅是挚友，更是世交。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梅溪昇¹⁶⁾以罗振玉送别会照片¹⁷⁾的介绍为切入点，从日本近现代史观出发对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进行解读，摘译了1984年至1940年间与日本相关连的记事，全面地考察了罗振玉和日本的关系，也为日本方面的罗振玉研究提供了相关史料和调查线索。此外，还摘译了罗振玉考察甲骨、敦煌文书问世、《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虚書契前編》、《殷虚書契后編》等著作的成书过程和原由。并在第一部分介绍了自己得以拜读《永丰乡人行年录》的经由，再录了大阪每日新闻对送别会的报道，录入送别会照片众人名字，其中不乏知名学者、收藏家、古董商等，由此也可略见罗振玉的在日交游。最后梅溪昇还强调了罗振玉在昭和史政治外交中的影响，近代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以及中日文化交涉史上的作用。

吕順長¹⁸⁾一文首先介绍了罗振玉在创立农学社、东文学社，创刊《农学报》、《农学丛书》、《教育世界》时与日本人的交往，这一时期的中心人物当属藤田剑锋，不仅担任教员、翻译农书，还为罗振玉介绍到上海访问的日本友人。然后，吕順長以《扶桑两月记》和《扶桑再游记》的记录为主考察了罗振玉1901年、1909年两次赴日考察时的访书活动。1901年赴日以视察日本教育为主要目的，因此购买了大量与近代教育相关的书籍，包括日本中小学教科书，1909年赴日除在琳琅阁、文求堂等书店访书外，还在内藤湖南、河井仙郎等处得以观看其藏书。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の研究》¹⁹⁾在介绍湖北省的学制体系时也提到了罗振玉的第一次赴日考察，称其对日本普通教育的普及程度感到震惊，并作《扶桑两月记》对各个学校视

12) 菅野智明与猿渡康文，〈『扶桑再遊記』にみる羅振玉と日本人——社会的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の視点から〉（《書学書道史研究》27号，2017年）

13) 菅野智明，〈羅振玉と明治末葉の東京〉（《中国文化》74号，2016年）89-92页。

14) 中国文化界指罗振玉在东京交往的中国学者、鉴藏家、出版人、书法篆刻家等。

15) 石田肇，〈羅振玉撰・内藤湖南書〈蒋黼墓誌銘〉をめぐって——蒋黼を中心に三人の交友について〉（《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編》48号，1999）33-48页。

16) 梅溪昇，〈羅振玉と日本との関係序説——羅繼祖輯述『永豊郷人行年録』を読む〉（《鷹陵史学》18号，1992）19-67页。

17) 1919年（日本大正八年）6月21日拍摄于圆山公园左阿弥庭园。

18) 吕順長，〈清末における羅振玉の日本視察と訪書活動〉（《文化共生学研究》17号，2018）19-32页。

19) 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

察的实际情况进行记录，包括学校所设的科目、建筑、器具、费用、学校学生的年限、等级、考试、学科顺序等等。并于回国后在《教育世界》中发表了三篇这次视察日本教育的直接见闻和个人见解，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陶德民²⁰⁾在为“山本竟山の書と学問——湖南・雨山・鉄斎・南岳との文人交流ネットワーク”展览会做准备的过程中发现清末刘鹗刊行的《铁云藏陶》、《铁云藏龟》题字出自日本书法家山本竟山之手，于是围绕题字得以实现的契机讨论了山本竟山与中国学者罗振玉、杨守敬之间的互动，因为新史料的出现²¹⁾修正了前文²²⁾罗振玉是因为杨守敬的推荐才决定请山本竟山题字的推测，因为罗氏显然比杨氏更早结识山本竟山。另外，刘鹗在罗振玉的鼓励下公开了《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不仅在时报刊登有关《铁云藏陶》、《铁云藏龟》的广告，还呼吁同道中人也拿出己藏公示于世，以求推进古文字学的研究，正如他们刊登的文章所言“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两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

三 罗振玉与友人往来信札

同志社大学藏罗振玉致德富苏峰信札14封，已有电子版在网上公开，道坂昭广将其分为上下两篇进行介绍。众所周知罗氏在日期间对中国古籍古写本、古刻本的调查十分热心，有《吉石庵丛书》四卷影印出版，这批信札即反映了罗氏在日期间的影印活动。上篇以《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宋槧三藏取经记残本》、《宋槧本庐山记五卷》等的影印为中心，罗氏与德富苏峰沟通希望可以借阅其藏书。下篇第9封是德富苏峰去中国旅行时罗振玉为他作的介绍信三封，分别介绍了方若、郑孝胥和刘承干。第10封以后，则是以足利学校藏《礼记正义》的影印为中心进行的沟通，虽然最终没有顺利出版，但也可以反映其出版活动过程。道坂昭广还借助郑孝胥、刘承干日记，德富苏峰《支那漫游记》为信札作了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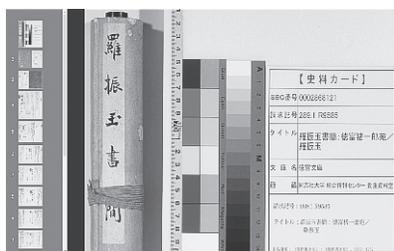


图3 羅振玉書簡：徳富猪一郎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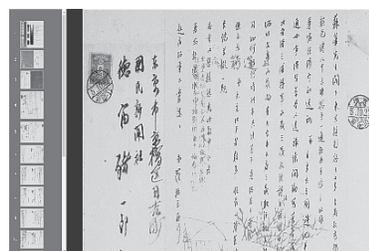


图4 羅振玉書簡：徳富猪一郎宛

菅野智明²³⁾对罗振玉藏沈增植信札进行了考察，共6封且没有落款日期，于是菅野氏对书写时间进行了推定，然后录入信札全文并考证。其中提到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出版之前，曾将样书寄给

20) 陶德民，〈竟山による『鐵雲藏陶』書名題字と羅振玉——古文字学と書学をめぐる清末の日中共働〉（《山本竟山の書と学問——湖南・雨山・鉄斎・南岳との文人交流ネットワーク》，2019年，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

21) 大桥成行和苏浩在拜访山本竟山的孙子山本宗生时发现了1902年山本竟山与罗振玉的笔谈记录。

22) 陶德民，〈山本竟山の中国デビューと清末の金石学——書名題字『鐵雲藏陶』の機縁について〉（『山本竟山の書と学問——湖南・雨山・鉄斎・南岳との文人交流ネットワーク』，2019年，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

23) 菅野智明，〈羅振玉旧蔵『沈乙盦尚書手簡』初探〉（《福島大学教育学部論集人文科学部門》63号，1997年）49-68頁。

沈增值校阅，沈增值指出了其在书法上的意义，如第四札中沈氏说“此为书法计”，主张应该重视书法方面的研究。王国维在自诩中虽说“尼雅所出木简十余，隶书精妙，似汉末人书”，事实上依然以史学考证为主，于是作为从事中国书学研究的学者，菅野指出了这批尺牍在书学史上的意义。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国文人历来喜欢对书法进行品评，敦煌遗书中有着大量的佛教文献，然而在五四运动以后，佛教成为封建愚昧的代名词，于是多数文人对敦煌遗书的评价从内容转向了书法鉴赏，这一倾向在现存的收藏题跋中十分明显。

苏浩²⁴⁾对罗振玉与山本竟山之间的书信、笔谈进行了考察，分为罗振玉第一次赴日考察和京都寓居期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书信4封，笔谈5枚，是两人较早的交流记录。第二阶段书信9封，笔谈8枚，这一阶段的书信大多没有信封，可能是同住京都，寓所较近的缘故，内容也涉及广泛，既有生活上山本竟山为罗振玉提供帮助的事例，也有为筹措生活费而变卖藏品的委托。

四 罗振玉参与的书画活动及其收藏

张明杰²⁵⁾主要对罗振玉在京都期间所参与的书学活动做了梳理，分析了其对日本中国书法文物鉴藏界产生的影响，考证了罗氏在参加与中国书画相关的雅集或展览时所提供的展品。如大正癸丑兰亭会、书法家山本竟山举办的和汉法书展览会、内藤湖南于京都大学夏季讲演会做“清朝史通论”时同时举办的“清朝书画展”、纪念苏轼诞辰而举行的寿苏会（即祝冥寿）等。罗氏参与的这些文墨活动，对当时及后来的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丰富了展品种类，还扩大了鉴藏者的视野，提高了鉴赏水平。然后，张明杰还整理了罗振玉在日期间有关敦煌遗书、甲骨、汉晋木简出土的辑录和刊印，这些出土文物不但改写了书法史，而且对考察书体沿革、书风传承，书法实践均有重大意义。又因为早期有关这些大发现的实物考释、辑录及出版，绝大多数都是由罗振在日本完成，因而东邻日本也较早地展开了对这些学问地研究。这些法书墨迹或图录文献作为书法学习与研究的指南，也成为促进日本书学繁荣的资源。最后，张明杰又考证了罗振玉通过出让、题跋等方式，向日本学界提供的中国书学文物资料，如大西见山和上野理一，他们一位从罗氏手中获得了大量的法书精品，一位获得了大量的碑帖拓本，罗振玉的书画买卖活动使我国部分文物流失海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日学者间的文化交流，为日本学者的中国学研究提供资料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松村茂树²⁶⁾对大妻女子大学藏「犬養木堂・羅振玉・長尾雨山等書畫帖」上出现的所有挥毫者进行了介绍，分别有犬养毅（号木堂）题字“山林大有人”、罗振玉“临秦虎符”、柚木玉邨“墨兰图”、长尾雨山“墨梅图”、小栗秋堂“墨菊图”、黄以霖“唐诗三首”、犬养木堂“光焰万丈”、宗星石“灵芝图”、柚木玉

24) 苏浩，〈羅振玉と山本竟山の文人交流：書簡と筆談を中心に〉（《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53輯，2020年）251-265頁。

25) 张明杰，〈京都寄寓時代の羅振玉の書学活動〉（《山本竟山の書と学問——湖南・雨山・鉄斎・南岳との文人交流ネットワーク》2019年，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本文有中文版《京都流寓 書學傳古——羅振玉及其書法文物鑒藏》发表在《文献语言学》2017。

26) 松村茂树，〈大妻女子大学蔵「犬養木堂・羅振玉・長尾雨山等書畫帖」について〉（《大妻女子大学紀要 文系》47号，2015）152-163頁。

邨“蟾蜍图”、山本梅莊“墨竹图”、滑川澹如“傲木堂书”、榭原鐵硯“唐诗一首”，松村茂树首先对每位挥毫者做简单的介绍，然后对他们之间因书画形成的文人交友网进行了梳理。

五 罗振玉和甲骨学、敦煌学的创立

罗振玉在甲骨学、敦煌学上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尤其在日期间所从事的学术整理工作，由高田时雄主编的《草創期の敦煌学》²⁷⁾共收录了14篇关于敦煌学的研究的文章，其中有3篇是以罗振玉为中心展开的。

- 1) 砺波护〈羅・王の東渡と敦煌学の創始〉
- 2) 白須淨真〈大谷光瑞と羅振玉——京都における敦煌学の興隆と第3次大谷探險隊〉
- 3) 赤尾栄慶〈上野コレクションと羅振玉〉

首先，砺波护²⁸⁾认为罗王东渡日本，并在日出版《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流沙坠简》对日本敦煌学的创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后列举了数种关于罗王对敦煌史所做贡献的先行研究，后半部分以罗王与桑原隲藏、内藤湖南等学者的交游展开。白須淨真²⁹⁾将罗振玉在日8年的轨迹与大谷光瑞探險队第三次探險的动向结合在一起，并列表格进行对比，更加直观的反映了草创时期敦煌学研究中各国学者间的互动交流。赤尾栄慶³⁰⁾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上野藏品入手，追踪到其中76件书迹都是来自罗振玉的藏品，并且至少12件都有罗振玉的跋文，最后针对两件法帖即宋拓《集字圣教序》、宋拓《十七帖》和两件西域出土写本即《三国志吴志第十二》残卷、《文选辨命论》进行了详细地考察。

敦煌文献研究初期，各国学者通过考古探險、访书的方式接触敦煌文献，并且以资料互用、情报交换、学术交流来促进敦煌学研究，陈琳琳³¹⁾对中、日、欧学者间的交流进行了梳理。中国学者以罗振玉、王国维、董康、张元济、端方为首，日本学者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羽田亨、濱田耕等京都学派学者为代表，欧洲学者以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为中心。首先按时间顺序对1900-1911年相关记事的公开文献进行整理录入，然后对1910-1925各国学者围绕敦煌学研究展开的访书活动和交流进行考察，最后以罗王为中心，以敦煌藏唐刻本《切韵》为例分析三国学者间的交流。高久由美³²⁾《羅振玉—甲骨文字研究の先蹤》强调了罗振玉在甲骨学创成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在日期间完成出版的甲骨学的著作分为两类进行介绍。一为甲骨资料集，二为甲骨文研究，罗振玉在甲骨学上的贡献，不仅有利于古文字研究、对殷代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27) 高田时雄主编，《草創期の敦煌学》，2002年，知泉書館。

28) 砺波护，〈羅・王の東渡と敦煌学の創始〉(《草創期の敦煌学》，2002年，知泉書館)。

29) 白須淨真，〈大谷光瑞と羅振玉——京都における敦煌学の興隆と第3次大谷探險隊〉(《草創期の敦煌学》，2002年，知泉書館)。

30) 赤尾栄慶，〈上野コレクションと羅振玉〉(《草創期の敦煌学》，2002年，知泉書館)。

31) 陈琳琳，〈敦煌文書発見初期における中・日・欧の学者間の対応と交流：王国維と羅振玉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11号，2018年) 377-393页。

32) 高久由美，〈羅振玉——甲骨文字研究の先蹤〉(《月刊しにか》13号，2002年) 49-54页。

六 其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举家搬往京都，钱鸥³³⁾以狩野直方、铃木教授等人的回忆，加之罗王二人关于住所的描述，考证了二人京都期间前后四处的住所位置，并绘制了地图。1911年刚到日本的罗振玉及其家人借住在田中家，即“田中飞鸟井町罗振玉旧居”，这里距狩野直喜旧宅步行不过三四分钟，因而彼此交往密切。初到日本的王国维、刘大坤两家也同时借住在田中家，于是罗氏又在京都大学附近为王国维另租住所，在田中村居住一年多后，罗振玉又以藤田丰八的名义在净土寺购地建房，也就是后来的永慕园，这里不仅是罗王从事研究的地方，也是京都大学学者们的学术沙龙举办地。1919年罗振玉回国时将永慕园捐赠给京都大学，后经转卖，最后拆除。永慕园拆除时，杉村邦彦³⁴⁾也撰文以表惋惜。

另外，钱欧³⁵⁾的博士论文以罗王赴日前的活动为中心，通过民国末期改革中的上海、与日本明治学术界的接触、《教育世界》的时代三章探究了两位学者的早期的学术活动，这一时期的活动多在上海且以教育活动为中心，如1901年罗振玉以私费创刊《教育世界》，介绍了日本明治中后期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论。钱欧还整理了藤田丰八的译著目录附在文章后面，共439部。钱欧认为作为研究古文字学、古文物学者的罗振玉在早期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事业，不仅是他对清末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尝试，也是其晚年学术形成的基础。

陈波³⁶⁾首先以罗振玉《集寥编》的记录对罗王赴日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概括，然后列出罗振玉在日期间制作的封泥和古铜印谱目录。录入和《雪堂印存》相关的序文，分别是〈室所藏玺印续集序〉、〈罄室所藏玺印续集序〉、〈齐鲁封泥集存罗振玉序〉、〈齐鲁封泥集存王国维序〉、〈赫连泉馆古印存序〉、〈赫连泉馆古印续存序〉、〈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序〉。又因大谷秃庵《梅花堂印赏》中的藏印是从罗振玉处得来，因此又录入吴昌硕、罗振玉、内藤湖南为此印赏所作序文。最后，围绕回国后的王国维为罗振玉的古铜印研究所做的助力展开讨论，如为罗振玉搜集印谱，邮寄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等。

陶德民、藤田高夫³⁷⁾《内藤書簡研究の新しい展開可能性について》第二部分主要以内藤湖南对罗振玉筹措《清实录》影印费的帮助进行讨论，罗继祖也在〈伪满影印《清实录》缘起及其挖改〉一文中记录了内藤氏对罗振玉的支持，虽然最终影印未能实现，但通过相关书简的查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交往。民国时期罗振玉曾将《王勃诗序集》翻刻为《王子安集佚文》，長谷部剛³⁸⁾围绕罗振玉对正仓院本《王勃诗序集》翻刻的经纬进行了探究。其实，中国最早认识到正仓院本《王勃诗序集》重要性的人是杨守敬，但杨守敬向中国的介绍不是很全面，首次全面地将它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便是罗振玉，但通过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内藤收到的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初刻本、重刻本可以发现，罗氏的校录、翻刻讹脱较多，这大概和正仓院本《王勃诗序集》是由欧体行草书写就，后半部分更是字迹杂乱，不易识别有关。

33) 钱欧，〈京都における羅振玉と王國維の寓居〉（《中国文学報》47号，1993年）156-169页。

34) 杉村邦彦，〈羅振玉の旧宅「永慕園」の消滅を惜しむ〉（《書学論纂》2018年，知泉书馆）569-571页。

35) 钱欧，〈清末の學術と明治日本：早期羅振玉と王國維を中心に〉1997年3月。

36) 陈波，〈中国古印研究〉（《史泉》87期，1998年）20-35页。

37) 陶德民；藤田高夫，〈内藤書簡研究の新しい展開可能性について：満洲建国後の石原莞爾・羅振玉との協働を例に〉（《關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47輯，2014年）39-56页。

38) 長谷部剛，〈羅振玉校録『王子安集佚文』について〉（《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29号，2008年）39-54页。

*文中所及学者，多为尊师前辈，为行文计，省略尊称。

结语

本文将日本学界关于罗振玉的先行研究分为六个部分进行概述，其中一部分文章是对罗振玉进行的多角度论述，关于此类文章以其最明显的特征进行归纳。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学界对罗振玉的研究多集中在罗振玉的赴日，罗振玉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友人间往来信札，罗振玉的收藏，在日期间的出版、访书活动，以及罗振玉对日本甲骨学、敦煌学创立的积极影响等。与中国全集、传记类的研究相比，日本学者关于罗振玉的研究主要是以专题形式展开的，其研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注重资料，慎下结论。日本学者注重资料的运用和文献考订，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且多用推测、猜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少下确定性结论，还会在文末提出自己下一阶段的研究构想以示同道人。二，注重统计，图表分析。在研究资料收集完成后，便开始做基础性的整理和考订工作，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量化对比，并找出其中的特征，用数据说话。三，以小见大。日本学者多从细小处推导大问题，虽然有时会导致有些推测可能过于牵强，但其推想可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启发。四，寻找新材料，开拓研究范围。正因为日本学者对材料的重视，才更加看重新材料的使用，在先贤前辈既有的研究基础上，若无新材料的使用，很难有新的突破，新材料的运用也可对其研究领域进行补充。日本学者重视史料，不尚空谈，但过于极端的“唯资料论”也是不可取的，另外，实证研究在操作层面的技术化与作业化可能会使学术论文缺失文化魅力，因而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既要学习日本学者“精雕细刻”的研究方法，也要注重史观及文化素养的表达，取长补短才更有利于学术进步。